

早期鲜卑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述评

吴松岩

[内容提要] 鲜卑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北方民族,在中国历史上产生过极大影响,但对于鲜卑的早期历史以及起源等问题,仅依据传统史料很难再有所突破,因此考古材料显得至关重要。本文就早期鲜卑的考古学主要发现与研究做了简要回顾和概括。

[关键词] 早期鲜卑 考古学 发现 研究

中文分类号:K871.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241(2009)01-0056-06

鲜卑是中国古代重要的北方民族,史书为其立传最早见于《三国志》和《后汉书》。据记载,鲜卑原属东胡,西汉初年匈奴冒顿单于势力强盛,大破东胡,东胡各部逃散,其中一支逃至鲜卑山,并以山为号^①。东汉早期由于匈奴的分裂和衰落,鲜卑逐渐崛起,至东汉晚期已“尽据匈奴故地”^②,建立了强大的军事部落联盟。虽然不久联盟瓦解,但自魏晋以降鲜卑已经成为中国北方最主要的民族之一。十六国时期,鲜卑建立的政权有前燕、后燕、南燕、西秦、南凉及西燕、吐谷浑和代(北魏),之后整个北朝的统治集团也主要是鲜卑。

本文所指早期鲜卑即鲜卑建国之前^③,其年代下限大致为公元3世纪末至4世纪初^④。

鲜卑早期事迹主要见于《三国志·乌丸鲜卑列传》、《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及《魏书·序纪》等。在近代考古学兴起之前,鲜卑的研究主要是由历史学家进行的。早在19世纪末,即有学者利用文献考证和比较语言学来研究鲜卑起源等问题。但由于比较语言学者个人研究角度不同,可比较的语言有限,因此所得结论难免有不妥之处。

新中国成立后,受到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指导,史学界开始对鲜卑政治、经济基础及社会发展形态等方面给予了更多关注。代表作当属马长寿先生的《乌桓与鲜卑》^⑤,书中对乌桓与鲜卑的经济生活、社会组织、各部分化及迁徙演变等论述甚

详,为区别拓跋鲜卑首次提出东部鲜卑的概念,明确提出了研究鲜卑的主要方向——起源问题(其中包括起源的地点和年代)、东部鲜卑与拓跋鲜卑区别问题、民族融合问题以及各部鲜卑迁徙问题等,而且马长寿先生还注意到了当时的考古材料,认为以后更多的考古材料将对鲜卑诸问题的解决起到重要的作用。马长寿先生将鲜卑分为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的分类方法,几乎成为定义,至今还在沿用^⑥;提出的研究方向仍是我们研究的主要课题;研究成果在今天还具有重要意义。

仅依据现存的古代文献,早期鲜卑的诸多问题几乎已经没有继续深入研究的空间,更多未知的资料只能通过考古发掘来获得,考古材料逐渐成为研究早期鲜卑不可或缺的部分。早期鲜卑的考古发现多集中在内蒙古东北部、辽西地区、内蒙古中部及山西的北部地区,这与文献中记载的鲜卑早期活动地域一致。由于鲜卑是游牧民族,“随水草放牧,居无常处”,^⑦因此在考古发掘中,其早期遗存主要是墓葬,除嘎仙洞可能是早期居址外,鲜见其他遗址。

一、考古发现

我国鲜卑的考古发掘应追溯至20世纪30年代日本人赤崛英三和江上波夫两次对包头市达茂旗白灵庙砂凹地6座鲜卑墓的发掘^⑧。

新中国成立后,科学发掘鲜卑墓葬始于60年

[作者简介] 吴松岩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在读博士 吉林 长春 130012

代——1960年内蒙古文物工作队对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扎赉诺尔墓地的发掘^⑨，虽然1959年已经对此处墓地进行了调查^⑩，但通过这次正式的发掘对墓地的葬制、葬俗及文化性质有了充分的了解和认识；1961、1962年在赤峰市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发现并清理了遗址和墓葬^⑪；1963年在呼伦贝尔市陈巴尔虎旗发掘了完工墓地^⑫；1969年在乌兰察布市察右后旗发掘了赵家房村墓葬^⑬；而在辽西地区发现并清理了慕容鲜卑早期的墓葬，北票房身村墓^⑭、义县保安寺墓^⑮。

80年代之后，是鲜卑考古学资料发现、发表的繁荣期。最重要的是内蒙古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的发现，在洞内发现了与《魏书》记载一致的祭祖祝文，使嘎仙洞成为追溯拓跋鲜卑早期历史甚至起源的重要坐标^⑯。各地鲜卑墓葬的发掘数量也大大增多，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呼伦贝尔市，1984、1986、1994年连续三次又对扎赉诺尔墓地进行了发掘^⑰，而且发现了另一处重要的早期鲜卑墓地——额尔古纳右旗的拉布达林墓地，分别于1987、1992年进行了发掘^⑱；在通辽市，通过普查确认了舍根遗存^⑲，其他较重要的还有北玛尼吐墓群^⑳、六家子墓群^㉑等；乌兰察布市也是鲜卑墓葬比较集中的地区，在2004出版的《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㉒一书中即发表有三道湾墓地、东大井墓地及兴和叭沟墓地，另外在其境内还发现了石家沟墓群^㉓、下黑沟鲜卑墓^㉔等；在山西省北部也发现了可能是早期鲜卑的墓葬^㉕。在内蒙古中西部地区即呼和浩特、包头市及以西地区，大同地区，辽西地区还发现了大量北魏、“三燕”时期墓葬，这为追溯早期鲜卑遗存特征提供了可参考的基点，但由于这些墓葬已超出本文所定年代下限，因此在这里不作讨论。

二、考古学研究

早期鲜卑的考古学研究是从新中国成立后才开始的，可分为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辨识期（20世纪50年代初——60年代末）

新中国成立不久，全国的考古工作刚刚展开，发掘数量有限，而且个别墓葬虽经发掘但资料未能及时发表（如1958年在内蒙古托克托县皮条沟发现三座鲜卑墓葬，但其发掘简报却发表于1991年^㉖），没有可供参考的材料，因此这一时期的墓葬

或不敢贸然断定其文化属性，如完工墓地；或就墓地的族属存在不同意见，如二兰虎沟墓地^㉗当时认为是匈奴遗存，在辽西地区虽仅发现两座墓葬，但也存在着鲜卑与乌桓的不同认识。这就引起大家对这类墓葬文化性质、族属的思考，尤其是扎赉诺尔墓地特殊的埋葬制度及葬具，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就该墓地族属引发了讨论，当时存在三种不同的意见，一种是以墓葬的发掘简报为代表，认为扎赉诺尔属于东汉末年鲜卑族的一支；另一种意见认为属于典型的匈奴文化遗物^㉘；还有一种看法即安志敏先生认为在当时考古资料没有完全发表以前，探讨族属是有一定困难的，推断扎赉诺尔是鲜卑或匈奴都缺乏充分的论据^㉙。

这阶段由于之前没有相关的资料作参考，缺乏对鲜卑等北方民族在考古学文化上的认识，因此对墓葬族属存在辨别不清的情况。但是这些墓地的发现，使学术界开始思考墓地的族属，通过讨论使鲜卑民族走进了考古学界的视野。

第二阶段确认期（20世纪70年代）

经过上一阶段资料的积累，宿白先生根据当时发现的与鲜卑有关的遗迹撰写了《鲜卑遗迹辑录》系列文章^㉚，这是第一次利用考古学资料对鲜卑进行的综合研究。其中《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一文，重点讨论了早期鲜卑相关遗存的特点，进而推定完工、扎赉诺尔墓地为拓跋鲜卑遗迹，南杨家营子、二兰虎沟以及达茂旗白灵庙砂凹地墓葬很可能是拓跋鲜卑遗迹，但也有可能是檀石槐——轲比能时期东部鲜卑遗迹；辽西地区所发现的墓葬是慕容鲜卑遗迹；并根据这些遗迹，对拓跋鲜卑迁徙、拓跋鲜卑与东部鲜卑的关系等问题作了更进一步研究。宿白先生对早期鲜卑墓葬定性的研究，为日后判定鲜卑墓葬提供了重要的标尺，文中很多研究思路、研究结论影响深远。

李逸友先生将扎赉诺尔墓地与史书记载、地望等诸多方面相结合，断定其为拓跋鲜卑遗迹，进而认为完工是早于扎赉诺尔，相当于推寅“南迁大泽”的初期阶段、南杨家营子则是拓跋鲜卑经历“山谷高深、九难八阻”越过大兴安岭南迁后的遗迹^㉛。

宿白先生与李逸友先生对完工、扎赉诺尔、南杨家营子墓地的性质、年代作出的论断比较相近，不过宿白先生更注意到完工、南杨家营子墓地可

能存在其他文化因素,如完工墓地含有匈奴因素,南杨家营子可能与东部鲜卑也有关系。

总之,这一阶段对几处较重要墓地文化属性的确定,使鲜卑遗存的特征逐渐呈现出来,并且对拓跋鲜卑的迁徙也有了大致的轮廓。

第三阶段繁荣期(20 世纪 80 年代至今)

随着考古材料的不断积累,更多的学者将目光聚焦在早期鲜卑研究上,并且涉及诸多方面。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

1. 鲜卑遗存的鉴别

鲜卑和匈奴在两汉时期均活跃在北方草原地区,两者遗存有某些相似因素,所以在初期,对一些墓葬属性就存在争议,如二兰虎沟、赵家房村等墓葬最初发掘者就认为是匈奴遗存。乌恩先生的《试论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②,列举出可能属于两汉时期鲜卑、匈奴墓葬,区分二者在陶器、饰品、葬俗方面的差异,虽然文中最后也提到,当时只能做到从大的方面将两者加以区别,难以将南北匈奴、乌桓鲜卑、拓跋鲜卑与慕容鲜卑区别开,但是却提示我们随着考古资料的积累,通过对遗物的仔细辨别并且结合文献,是有可能将这些问题逐步解决的。

另一方面嘎仙洞的发现,证实了内蒙古东北部是拓跋鲜卑早期活动甚至起源的地区,之后在我国东北部地区陆续发现的一些墓葬,曾一度被认为是鲜卑遗存,如兴隆山墓葬^③、老河深中层墓群^④等。在注意到鲜卑与匈奴遗存之间差别的同时,学者们开始对部分鲜卑遗存提出异议,争议主要集中在完工墓地、兴隆山墓葬、老河深墓葬以及南杨家营子等墓葬。

陈雍先生的《扎赉诺尔等五处墓葬陶器的比较研究》^⑤,通过分析陶器的分类和组合,与“基点墓”(北魏墓葬)对比最后论证出扎赉诺尔墓、南杨家营子墓为鲜卑早期遗存,老河深墓、兴隆山墓应从鲜卑墓葬中汰除,完工墓地有待考虑。

乔梁先生的《鲜卑遗存的认定与研究》^⑥,是继宿白先生《鲜卑遗迹辑录》之后又一篇鲜卑考古学综合研究力作。文中根据文化特征的差异,将当时发现的与鲜卑有关的遗存分为 7 群,分述每群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再具体探讨每一群对应的族属,最后将完工墓、兴隆山墓、伊敏车站墓为代表的 B 群、老河深为代表的 C 群从鲜卑遗存中甄别出来,

并认为完工墓地为代表的 B 群很可能是汉书二期文化的继承者,老河深墓的前身很有可能是西团山文化,南杨家营子未列入任何一群,作为特例单独讨论,认为现有资料不足以确定其具体族属。其余鲜卑遗存,以扎赉诺尔为代表的 A 群可能是北魏时期拓跋鲜卑遗存的主要来源之一,辽西地区的 D 群可能属于慕容鲜卑,内蒙古中部以二兰虎沟、三道湾等墓葬为代表的 E 群可以同檀石槐—轲比能时期的鲜卑大联盟中的早期东部鲜卑相对应,内蒙古兴安盟的北玛尼吐墓群 F 群应属东部鲜卑,但究竟属于何种鲜卑还有待进一步的发现与研究,“舍根文化”的 G 群可能是慕容鲜卑的前身或早期遗存。在大致确定各遗存的年代和族属之后,最后结合文献对两部鲜卑(东部鲜卑和拓跋鲜卑)早期发展、迁徙又做了简要的梳理。

林运先生在《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一书的序中也对完工墓地、南杨家营子墓地的族属提出疑义^⑦。不久潘玲针对完工墓地做了细致的分析,通过完工墓地各类出土遗物、葬俗、人种特征与东部地区和俄罗斯外贝加尔地区相关遗存的对比,认为完工墓葬的年代相当于西汉时期,以汉书二期文化为主体,同时受到较多西汉匈奴文化的影响^⑧。

鲜卑遗存的甄别大致有着从宏观向微观发展的趋势,首先明确鲜卑与匈奴之间的宏观差异,再逐渐从鲜卑遗存中鉴别出非鲜卑遗存,最后就有争议的墓地展开个例分析。而且在族属的讨论上,已经不仅仅局限于匈奴或鲜卑这样大的范围,尝试作更细致的分析,力图将考古遗存与鲜卑具体部落相对应。

2. 鲜卑溯源研究

根据研究侧重点不同,可分以下两类:

一是将晚期(北魏、“三燕”时期)遗存作为基点,向上追溯其早期遗存的特点。以许永杰、田立坤等学者的相关文章为代表^⑨,研究的基本方法是以年代、族属明确的晚期墓葬作为基点,归纳晚期拓跋鲜卑或慕容鲜卑的考古学文化特征,再利用陶器的型式演变,向上追溯相应的早期遗存,进一步归纳出拓跋鲜卑、东部鲜卑早期遗存的考古学特点。许永杰先生的文章较侧重于文化因素的分析,得出各早期遗存构成因素都比较复杂的结论,最后根据谱系研究,认为北朝时期的拓跋鲜卑遗

存主要源自东汉时期的扎赉诺尔一类遗存；十六国时期可能属于慕容鲜卑的遗存起源与扎赉诺尔一类遗存有关，又与完工一类遗存有关；二兰虎沟一类遗存可能与宇文鲜卑的活动有联系。田立坤先生选取的基点墓较有针对性，分别是慕容鲜卑和拓跋鲜卑三、四世纪的都城——龙城（今辽宁省朝阳市）和平城（今山西省大同市）发现的墓葬，文章侧重诸早期遗存间的渊源关系，通过研究认为完工时代最早，其次是扎赉诺尔，但完工并没有直接发展为扎赉诺尔；扎赉诺尔分为二兰虎沟和南杨家营子两支，南杨家营子又分化为东部鲜卑。

二是探讨早期鲜卑的起源，问题集中围绕在拓跋鲜卑的起源地点、拓跋鲜卑与东部鲜卑是否同源以及两者之间的联系和差别等方面。

在考古学研究没有展开之前，史学界就对这个问题的持同源、异源不同的意见。“同源说”即拓跋鲜卑与东部鲜卑同出于东胡，拓跋鲜卑起源地在今内蒙古大兴安岭的北段，但对拓跋鲜卑的形成时间又稍有异议，马长寿先生认为拓跋鲜卑是“鲜卑父匈奴母”产生的，其祖先只能称为鲜卑而不能为拓跋鲜卑，只有和匈奴融合之后才为拓跋鲜卑^④；林干先生却认为拓跋鲜卑早在汉初甚至更早就已在大兴安岭北段驻牧，东胡被匈奴击破，其中一支转向大兴安岭南段的鲜卑山，绝非偶然可能是想投靠或靠近自己的同种拓跋鲜卑^⑤。“异源说”认为拓跋鲜卑别有世系渊源，以张博泉先生的《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⑥为代表，认为拓跋鲜卑起源地在贝加尔湖南，肯特山之北。

考古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受史学界“同源”说的影响很大，很多考古学者也持“同源”的看法，如田立坤《鲜卑文化源流的考古学考察》一文，认为两部鲜卑是同源的。但大部分文章只是在文中稍有涉及，并未就起源问题深究。对这一问题进行了专门讨论的当属郑君雷的《早期东部鲜卑与早期拓跋鲜卑族源关系概论》^⑦，在归纳两部鲜卑文化面貌联系和差别的基础上，对两者的族源关系进行深入的探讨，认为根据嘎仙洞祝文推导大兴安岭北段地区是“大鲜卑山”的观点值得商榷，只能说明是早期拓跋鲜卑的活动区域，并不能证明就是起源地，并推测其起源地靠近汉代高车分布的贝加尔湖地区。最后认为早期东部鲜卑与早期拓跋鲜卑应是“异源”，应明确区别为两个民族。

在当时虽然鲜有学者持这种“异源”说法，但却提示我们在探究早期鲜卑历史及起源时，不应把目光仅局限在国内，应将早期鲜卑置于整个北方草原的大背景下。

鲜卑溯源研究，首先是把东部鲜卑、拓跋鲜卑的早期遗存通过谱系研究的方法区别出来，在这个基础上，再根据区别出的早期遗存的特征，试图探究其起源。研究焦点集中于拓跋鲜卑的起源问题上，目前仍未取得一致的认识，期冀今后考古材料的丰富能使这一问题逐渐明朗。

3. 人种学研究

最早对鲜卑进行人种学研究的是潘其风、韩康信两位先生，他们研究了完工墓地、扎赉诺尔墓地前两次发掘和南杨家营子墓地所获得的人骨材料^⑧。鉴定的结果是，完工颅骨较接近北极（东北亚）蒙古人种，同时可能含有某些北亚（西伯利亚）和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扎赉诺尔古代居民可能以北亚蒙古人种和北极蒙古人种的混血类型为主，还可以看到某些东亚蒙古人种的因素；南杨家营子居民则与北亚蒙古人种最接近，也存在某些东亚或北极蒙古人种的因素。

之后朱泓先生对扎赉诺尔第三次发掘的墓葬^⑨、三道湾墓地^⑩、朝阳十二台营子^⑪人骨材料进行研究，结论是都属于北亚蒙古人种，个别特征受到某些东亚蒙古人种的影响。朱泓先生还对扎赉诺尔三次发掘的头骨进行了全面考察，将之分成两组：A组以北亚蒙古人种为主体，B组可归属为北亚人种和北极人种的混血类型。A组与外贝加尔地区的匈奴组最为相似，并超过了与B组之间的关系；而B组却与完工组最为相似。也就是说扎赉诺尔墓地的鲜卑族居民似乎处于一种介于完工居民和匈奴人之间的过渡位置。扎赉诺尔汉代B组或许就是一组“胡父鲜卑母”或“鲜卑父胡母”的混血类型的代表^⑫。

上述研究为后来的人种学分析提供了可对比的数据，之后又陆续发表了内蒙古察右中旗商都县东大井墓地^⑬、兴和县叭沟墓^⑭人种学鉴定成果，结论均是以北亚人种为主。通过一系列的人种学分析，逐渐认识到鲜卑人种应属于北亚蒙古人种，也得出了完工墓主人不属于鲜卑人的认识^⑮。

人种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相辅相成，其成果逐渐成为研究早期鲜卑重要的辅助材料。许多涉

及甄别鲜卑遗存,鲜卑渊源等方面的文章,都会引用人种学的材料,为自己的论点提供更加可信的论据。

三、小结

综上所述,对早期鲜卑的考古学认识,经历了从无到有的过程,而且随着资料的丰富,关注与研究的角度也逐渐多元。通过这些发现与研究成果,我们已对早期鲜卑的起源、迁徙、社会经济状况等方面有了大致的了解,但还是有存在争议或是未能研究透彻之处,例如鲜卑的起源问题。一些问题无法研究透彻,是考古学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而跨学科合作,跨地域交流将有助于扩大我们研究的视野。比如人种学在考古学中的应用就是一个很好的开端,最近还有学者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探讨鲜卑族属^②,这些都为鲜卑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视野和手段,而要解开拓跋鲜卑的起源之谜,似乎要把鲜卑置于当时北方草原的大背景下,境外的材料就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跨地域的国际交流在今后肯定会逐渐增多。相信随着考古学不断的进步,能够帮助我们逐渐解决早期鲜卑的诸多未决之谜。

注 释

①《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三国志·乌丸鲜卑列传》。

②《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③“早期鲜卑即指鲜卑建国之前阶段”引自乔梁:《内蒙古中部的早期鲜卑遗存》,《青果集——纪年吉林大学考古系成立十周年》,知识出版社,1998 年版。

④公元 315 年拓跋部由拓跋猗卢以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为都建立代政权;慕容鲜卑于公元 284 年由慕容廆立国。

⑤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版。

⑥“东部鲜卑”一词,近年来林沅先生提出质疑,认为“东部鲜卑是一个没有明确界定而自相矛盾的分类概念,当然不能视为文化分类概念。今后在考古遗存分析中,似乎不宜继续使用这个名词”。见《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序》,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但是本文为了行文的方便,暂仍使用“东部鲜卑”一词。

⑦《后汉书·乌桓鲜卑列传》。

⑧见[日]江上波夫:《内蒙古百灵庙凹地の古坟》,

《アジア文化史研究·论考篇》,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1967 年;转引自孙危:《鲜卑考古学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7 年版。

⑨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发掘简报》,《考古》,1961 年第 12 期。

⑩郑隆:《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调查记》,《文物》,1961 年第 9 期。

⑪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南杨家营子的遗址和墓葬》,《考古》,1964 年第 1 期。

⑫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工作队:《内蒙古陈巴尔虎旗完工古墓清理简报》,《考古》,1965 年第 6 期。

⑬盖山林:《内蒙古察右后旗赵家房村发现匈奴墓群》,《考古》,1972 年第 2 期。

⑭陈大为:《辽宁北票房身村晋墓发掘简报》,《考古》,1960 年第 1 期。

⑮刘谦:《辽宁义县保安寺发现的古代墓葬》,《考古》,1963 年第 1 期。

⑯a 米文平:《鲜卑石室的发现与初步研究》,《文物》,1981 年 2 期。b 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鄂伦春自治旗嘎仙洞遗址 1980 年清理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 年版。

⑰a 王成:《扎赉诺尔圈河古墓清理简报》,《北方文物》,1987 年第 3 期。b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扎赉诺尔古墓群 1986 年清理发掘报告》,《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4 年版。c 陈凤山、白劲松:《内蒙古扎赉诺尔鲜卑墓》,《内蒙古文物考古》,1994 年第 2 期。

⑱a 赵越:《内蒙古额右旗拉布达林发现鲜卑墓》,《考古》,1990 年第 10 期。b 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呼伦贝尔盟文物管理站、额尔古纳右旗文物管理所:《额尔古纳右旗拉布达林鲜卑墓群发掘简报》,《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版。

⑲张柏忠:《哲里木盟发现的鲜卑遗存》,《文物》,1981 年第 2 期。

⑳钱玉成、孟建仁:《科右中旗北玛尼吐鲜卑墓葬》,《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 年版。

㉑张柏忠:《内蒙古科左中旗六家子鲜卑墓群》,《考古》,1989 年第 5 期。

㉒魏坚主编:《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 年版。

㉓内蒙古博物馆:《卓资县石家沟墓群出土资料》,《内蒙古文物考古》,1998 年第 2 期。

②④郭治中、魏坚:《察右前旗下黑沟鲜卑墓及其文化性质初论》,《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4年版。

②⑤a 王克林、宁立新、孙春林、胡生:《山西省右玉善家堡墓地》,《文物季刊》,1992年第4期。b 雷云贵、高士英:《朔县发现的匈奴鲜卑遗物》,《山西省考古学会论文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②⑥金学山:《内蒙古托克托县皮条沟发现三座鲜卑墓》,《考古》,1991年第5期。

②⑦a 郑隆:《内蒙古文物工作组再一次调查二兰虎沟的匈奴古墓》,《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第11期。b 李逸友:《内蒙古西部地区的匈奴和汉代文物》,《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第4期。c 郑隆、李逸友:《察右后旗二兰虎沟的古墓群》,《内蒙古文物资料选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⑧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新中国的考古收获》,第88页,文物出版社,1961年版。

②⑨安志敏:《关于内蒙古扎赉诺尔古墓群的族属问题》,《文物》,1964年第5期。

③⑩a 宿白:《东北、内蒙古地区的鲜卑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一》,《文物》,1977年第5期。

b 宿白:《盛乐、平城一带的拓跋鲜卑——北魏遗迹——鲜卑遗迹辑录之二》,《文物》,1977年第11期。

c 宿白:《北魏洛阳和北邙陵墓——鲜卑遗迹辑录之三》,《文物》,1978年第7期。

③⑪李逸友:《扎赉诺尔古墓为拓跋鲜卑遗迹论》,《中国考古学会第一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79年版。

③⑫乌恩:《试论汉代匈奴与鲜卑遗迹的区别》,《中国考古学会第六次年会论文集》,文物出版社,1990年版。

③⑬吉林省文物工作队:《通榆县兴隆山鲜卑墓清理简报》,《黑龙江文物丛刊》,1982年第3期。

③⑭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榆树老河深》,文物出版社,1987年版。

③⑮陈雍:《扎赉诺尔等五处墓葬陶器的比较研究》,《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③⑯乔梁:《鲜卑遗存的认定与研究》,《中国考古学的跨世纪反思》下,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③⑰林沄:《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

序》,《内蒙古地区鲜卑墓葬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

③⑱潘玲:《完工墓地的文化性质和年代》,《考古》,2007年第9期。

③⑲a 许永杰:《鲜卑遗存的考古学考察》,《北方文物》,1993年第4期。b 田立坤:《鲜卑文化源流的考古学考察》,《青果集——纪念吉林大学考古系成立二十周年》,知识出版社,1993年版。

④⑰马长寿:《乌桓与鲜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

④⑱林干:《鲜卑拓跋、秃发、乞伏三部的早期历史及其南迁路线的初步探索》,《北方文物》,1989年第4期。

④⑲张博泉:《嘎仙洞刻石与对拓跋鲜卑史源的研究》,《黑龙江民族丛刊》,1993年第1期。

④⑲郑君雷:《早期东部鲜卑与早期拓跋鲜卑族源关系概论》,《青果集——纪念吉林大学考古系成立十周年》,知识出版社,1998年版。

④⑲潘其风、韩康信:《东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人骨的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第1期。

④⑲朱泓:《扎赉诺尔汉代墓葬第三次发掘出土颅骨的初步研究》,《人类学学报》,1989年第8卷。

④⑲朱泓:《察右后旗三道湾汉代鲜卑族颅骨的人种学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第二集),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

④⑲朱泓:《朝阳魏晋时期鲜卑墓葬人骨研究》,《辽海文物学刊》,1996年第2期。

④⑲朱泓:《从扎赉诺尔汉代居民的体质差异探讨鲜卑族的人种构成》,《北方文物》,1989年第2期。

④⑲陈靓、朱泓、郑丽慧:《内蒙古东大井东汉时期鲜卑墓葬人骨研究》,《内蒙古文物考古》,2003年第1期。

⑤⑰张全超、周蜜:《内蒙古兴和县叭沟墓地汉魏时期鲜卑族人骨研究》,《边疆考古研究》第四辑,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

⑤⑰陈靓:《匈奴、鲜卑和契丹的人种学考察》,吉林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3年版。

⑤⑰郑君雷:《文化人类学的族群认同与考古学文化的族属研究——汉末魏晋河套阴山地区北方民族遗存族属研究的个案思考》,《思想战线》,2007年第4期,第33卷。

责任编辑:祝立业